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传世名画，一直被誉为国宝。

而它曾从清宫流出，直至一九五九年回归故宫博物院，其间的去向与流转经历一直众说纷纭，出现了「沈阳说」「长春说」和「通化说」。目前普遍认为难以断定哪一种是真的。

笔者在整理父亲吴溉之的革命生平事迹时，偶然接触到《清明上河图》回归问题，研究考证后写成此文。

特稿

《清明上河图》回归疑案

吴峰风

一九四二年六月陕西延安安生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系本科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退休），曾任所长

国宝真迹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

河图》大概是我国最著名的古代绘画了。

一九五〇年的一天，一位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仓库里，忽然间眼前一亮，反复审视着一幅五米多长的画卷，发现这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清明上河图》的真本！

东北博物馆，现名辽宁省博物馆。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国宝鉴定大师」的杨仁恺先生。他没有上过大学，自称「琉璃厂大学」毕业。

一九五〇年六月，东北银行拨交东北博物馆一百二十余件《佚目》书画和百件珠宝玉翠。杨仁恺在其巨著《国宝沉浮录》（辽宁人民出版社，二〇二〇年一月第一版，本文所引统一为此版本）中回忆当年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情景：

……没有想到的是，在拨交的《佚



阅读链接

杨仁恺（一九一五年～二〇〇八年）

◎ 杨仁恺，一九一五年十月出生于四川广安岳池县，中国现代书画鉴赏大师。他对故宫流失国宝书画做了大量深入探寻与研究，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完成巨作《国宝沉浮录》。曾任中国古代书画全国巡回七人鉴定小组成员，对国内所藏书画逐一过目，鉴定真赝，摸清了中国历代书画艺术作品的家底。其晚年任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等多种名誉职务；因其杰出的贡献，被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他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病逝于沈阳，享年九十三岁。

目》书画中竟发现了张择端描绘北宋后期首都汴梁清明时节民间风物的《清明上河图》，且完好无损，真乃为之庆幸万分！

历史上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不知凡几，仅我过目的就有十余件之多。一九五〇年六月，东北银行拨交东北博物馆一批《佚目》书画，当时玉石未分，良莠杂存，亟待鉴定整理。我有幸参加了交接与整理工作，工作中得知书画中有三件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我起初以为，所谓《清明上河图》肯定过去常见的「苏州片」一类的东西，思想上压根就没有想到会有奇迹出现，殊不知数百年来一直埋没于传闻中的张择端巨迹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被发现了，我当时的心怦然跳动，兴奋已极，不能用文字和语言表达于万一！

三件中既然存在一件真迹，其余两件理当都是赝品。然而，意料之外的奇迹再次发生，我竟又惊喜地看到了一件具仇英名款的工笔重彩《清明上河图》。仇氏之作与张氏作品的构图形式基本一致，只是改用苏州社会生活为背景，自





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绢本设色 纵二四·八厘米 横五二八·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始也揭开了明代小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原来坊间之作都是出自仇氏此图。（《国宝沉浮录》，第四〇三页）

可知当时三件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中，有一件为真迹，另有一件为仇英仿作，第三件据《国宝沉浮录》「《佚目》书画总目」所记当为明代坊间绘制的赝品，俗称「苏州片」。

当杨仁恺将真迹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时，这件文物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和兴趣。一九五三年一月，在东北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祖国的古代艺术特别展」上，这幅名画首次公开面世。随后此画又被调往北京，于同年十一月一日在故宫展出，更掀起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和热议。

东北银行拨交的书画不仅有《清明上河图》，还有许多作品同样极为珍贵，如《曹娥谏辞》《簪花仕女图》，这两件就被称为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外，一九五七年，东北博物馆奉命将馆藏五代黄筌《珍禽图》、北宋张

唐 周昉（传） 簪花仕女图

绢本设色 纵四六厘米 横一八〇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著录。谢稚柳定为唐人作品，杨仁恺认为是宋人之作。一九五〇年东北银行拨交。（参见《国宝沉浮录》）





东晋人书（传） 曹娥誄辞卷

绢本墨笔 纵三二·五厘米 横五四·三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石渠宝笈初编》（养心殿）著录，又名《孝女曹娥誄辞》。关于作者，各家观点不一，莫衷一是，杨仁恺认为是东晋人所书。（参见《国宝沉浮录》）



择端《清明上河图》、北宋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这四卷画作送京鉴定。一九五九年，上述四件被调拨给故宫博物院，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等从此留在了故宫博物院。

二〇〇九年，辽宁省博物馆庆祝建馆六十周年，举办「清官散佚书画国宝特展」。特展充分展示了辽博的馆藏实力，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东北银行移交国宝的整体水平。其中有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石渠宝笈三编》（乾清宫）著录；赵佶《草书千字文》，《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张旭《古诗四帖》，《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宣和书谱》著录为谢灵运《古诗帖》，《佚目》著录为贗本，今人以为宋人之作；赵佶《瑞鹤图》，《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著录；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石渠宝笈初编》（重华宫）著录。

前文提到的「《佚目》书画」一词，事关《清明上河图》从故宫流出的史实，须在此重点说明解释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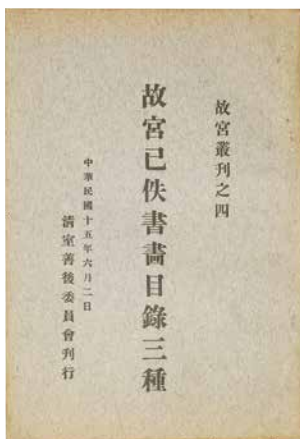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之后，溥仪在紫禁城中长到十六七岁时，与其弟溥杰商议，为

出国留学，再回国复辟，要先准备经费，于是以「赏溥杰」之名，将宫中价值连城的书画精品等大肆盗出宫外。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自述：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社会的认识比我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于是溥杰就每天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国言实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第一四〇页）

一九二四年溥仪被逐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四本清官账册：《赏溥杰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字画浮记簿》，记录了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到十二月十二日，溥仪与溥杰共造成书画手卷一千二百八十五件、书画册页



《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封面



“清室善后委员会”查封宫门旧影



一九二四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在故宫养性殿合影



长春“小白楼”旧影
吴峰风供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所俘
吴峰风供图

六十八件、古书二百一十部、图章一匣四十五件、皮包十四件流出宫外。「清室善后委员会」据此印行了《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简称《佚目》，登录其上的已佚书画即被称为《佚目》书画。溥仪盗取的书画珍宝等先运至天津，后转移到长春，收藏于伪皇宫书画

楼，俗称「小白楼」。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溥仪携带精心挑选的部分书画珍宝逃往通化大栗子沟，其余大部分书画文物等遭卫兵哄抢损毁及流散到国内外各处。八月十九日，逃离大栗子沟的溥仪与溥杰等共九人，从通化乘小型军用飞机欲

逃往日本，拟于沈阳机场换乘大飞机时为苏军所俘，押往西伯利亚。

从此，那卷《清明上河图》就不知落到了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竟成一桩疑案。直到一九五〇年被杨仁恺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仓库里发现。

疑案辨析

对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在溥仪逃亡之后的去向，随时间推移，逐步形成了三类不同说法——「沈阳说」「长春说」和「通化说」，目前普遍认为难以断定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

「沈阳说」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的说法是：溥仪一伙逃亡中在沈阳为苏军所俘，随身携带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则被东北民主联军（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大批进入东北地区，十月三十一日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缴获，后移交东北银行代为保管。

这是「沈阳说」的来源，并由此衍生出了一些情节略有不同的版本，例如有一种是说溥仪在沈阳机场为苏军所俘，混乱之中溥仪的皮箱遗落（或书画珍宝散落）机场，后辗转到了我军手中等。

然而无论「沈阳说」的哪一类情节，都不曾提供过任何具体证据。且不说一

九四五年八月我军尚未到达沈阳，之后解密的前苏联克格勃档案中也从无关于溥仪书画的记载。最根本的一点是，溥仪从大栗子沟出逃时，并没有携带任何书画手卷，所有书画都随他的大部分亲眷和宫廷人员一同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一情况有溥仪本人和随他逃亡人员的回忆为证。沈阳故宫博物院王文锋研究员

的专著写得更清楚一些：「……挑选完随行人员，溥仪又令随侍李国雄再挑一些珍宝携带，挑出的珍珠、钻石、翡翠、猫眼以及多种宝石和名贵的金表，金首饰等，足足塞满了一皮箱。此外，还给溥仪带上了一箱随身使用的物品和换洗的内衣。因其他的箱子上都印有伪满皇宫标志的『兰花御纹章』，这是万万不能用的，就临时抓了一只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装了进去。还带上了一小箱药品，带了些常用药，还有一些安眠药。随行的其他人员，谁也没带东西，就穿着一身西服，都想一到日本就好办了。」（王文锋《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溥仪研究》二〇一四年第四期）

因溥仪从大栗子沟逃亡时并未携带任何书画，《清明上河图》无从在沈阳

被截获，故「沈阳说」明显属于以讹传讹，可以完全排除。

「长春说」

在东北以至全国的文博事业中，有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辈——王修同志。他对文物有浓厚兴趣，又有历史文化素养。一九四八年四月人民政府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北文管会」），王修为常委兼办公处处长，实际负责所有具体事务。十一月，东北文管会由哈尔滨迁至沈阳，他一手张罗筹建的东北博物馆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开放最早的一座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王修兼首任馆长。

一九八七年，王修同志在回忆文章《林枫与东北文物工作》中述说了一件张克威同志上缴《清明上河图》的事：「一九四八年张克威同志从部队下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任职，他带来长春伪宫散出的十余轴画卷，交给了林枫同志。这是乾隆『石渠宝笈』所藏历代名画中的东西，可能也就是所谓《溥仪赏溥杰书画目》一千三百轴中的一部



阅读链接

张克威（一九〇一年～一九七四年）

◎ 张克威，一九〇一年出生在吉林东关昌邑屯“张进士府”。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吉林市两级师范学校。一九三一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回国后，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一二九师民运生产部部长。曾任长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沈阳农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沈阳农业大学（旧称沈阳农学院）的创立人。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张克威因患原发性肝癌，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阅读链接

王修（一九〇八年～一九八八年）

◎ 王修，山东省黄县东北隅村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到达延安，一九三八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晋西南和晋西区主编区党委机关报《五日时事报》。一九四八年四月任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处处长等职，亲自筹建了东北图书馆、东北博物馆。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二年，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副主任，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在西安逝世，享年八十岁。

分。《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林枫同志发现后，立即找来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人进行了鉴定，并交东北文管会珍藏。」（王修《林枫与东北文物工作》，《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1999-2008）》1100九年）这是「长春说」的来源。

后来，在一篇记者文章《张克威献出〈清明上河图〉真迹》中，作者补充了一件王修文章中不存在的事：「后来，东北文管会从哈尔滨迁到沈阳，因为当时还比较混乱，书画便放到了较为安全的东北银行暂存。」（《张克威献出〈清明上河图〉真迹》，《沈阳日报》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就是「长春说」的基本内容。

这一说法的最关键处就是王修前辈的一句「《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如果此话属实，确有张克威前辈交给林枫，林枫交东北文管会珍藏的一卷《清明上河图》，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杨仁恺发现的那一幅张择端的真迹吗？似乎没有这种可能。东北文管会保存的文物，无论是否在东北银行暂存，都会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东北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前，将其登记入藏，以保证博物馆如期

对外开放并展示。它不可能在正式开馆几乎一年之后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再由东北银行拨交入藏该馆。

一九五〇年六月，是个关键的时间点。因时隔久远，东北银行向东北博物馆拨交一批书画和珍宝的确切时间曾经有过多种不同说法，后来发现了东北博物馆一张分类卡片背面的「备考」栏有标注：

此卷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我从东北银行接收当时，画身全部查有虫伤甚重。现经详细检查，共有虫伤二百三十七处。同时对虫伤处一部份加以照像。特此注明。

1952.7.8. 杨孟雄（并盖章）

标注这段文字的杨孟雄，一九五〇年任东北博物馆研究室科长，一九五二年任保管科科长，是接收这批《佚目》书画的参与者之一。据此可知一九五〇年六月是东北银行向东北博物馆拨交的确切时间。

此事记载于辽博研究员戴立强先生《佚目书画二三事》一文中。正是由于戴立强先生考证了东北银行拨交的确切时间，杨仁恺先生才在新版《国宝沉浮

录》多次用「一九五〇年六月」纠正了旧版中不准确的拨交时间以及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时间。但很可惜，有重要一处未予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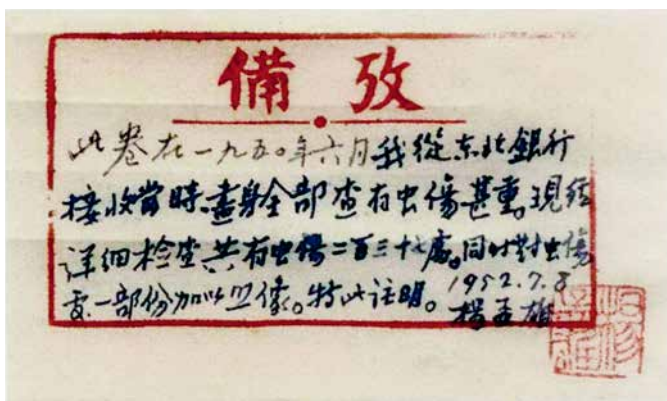
「溥仪携逃所带之物大都由东北抗日联军缴获，之后移交东北银行保管，再之后经陈云批示，由东北银行于一九四八年底拨交给筹建中的东北博物馆。」（《国宝沉浮录》，第三二二—三二三页）

所说「一九四八年底拨交给筹建中的东北博物馆」，是旧版旧说遗痕，应予纠正。但「经陈云批示」这一说法究竟出自何处，以及准确的批示时间和内容均需要落实。因为这一说法不仅见于《国宝沉浮录》，之后也时有文章引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前所述，如果确有张克威上交的这一件《清明上河图》，它应该不会是那件真迹。因为它和真迹在发现和入馆时间上没有交集。

然而问题在于，目前却找不到张克威上交的这一件《清明上河图》！

我们知道，故宫之内上万件珍藏的书画，自乾隆朝到嘉庆朝，陆续编有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初、续、三编。



杨孟雄文物卡片标注

据此可知东北银行向东北博物馆拨交文物的确切时间

吴峰风供图

凡被著录于《石渠宝笈》各编的书画都钤有相应印章，可以依据这些印章的有无和真伪来判断一件书画作品是否来自宫内收藏。溥仪盗出宫的《佚目》书画，不管流失到哪里，都有《石渠宝笈》和《佚目》可查。从《国宝沉浮录》一书的「《佚目》书画总目」中可以检索出，溥仪移出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共五件：

仇英《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真迹。辽

宁省博物馆藏（东北银行拨交）。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真迹。原东北博物馆藏（东北银行拨交），一九五九年拨归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明代苏州片。辽宁省博物馆藏（东北银行拨交）。

谢遂《仿明人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乾清宫）著录。真迹。原在天津金石山房处（即五十年代仍藏于天津金石山房，现已不知所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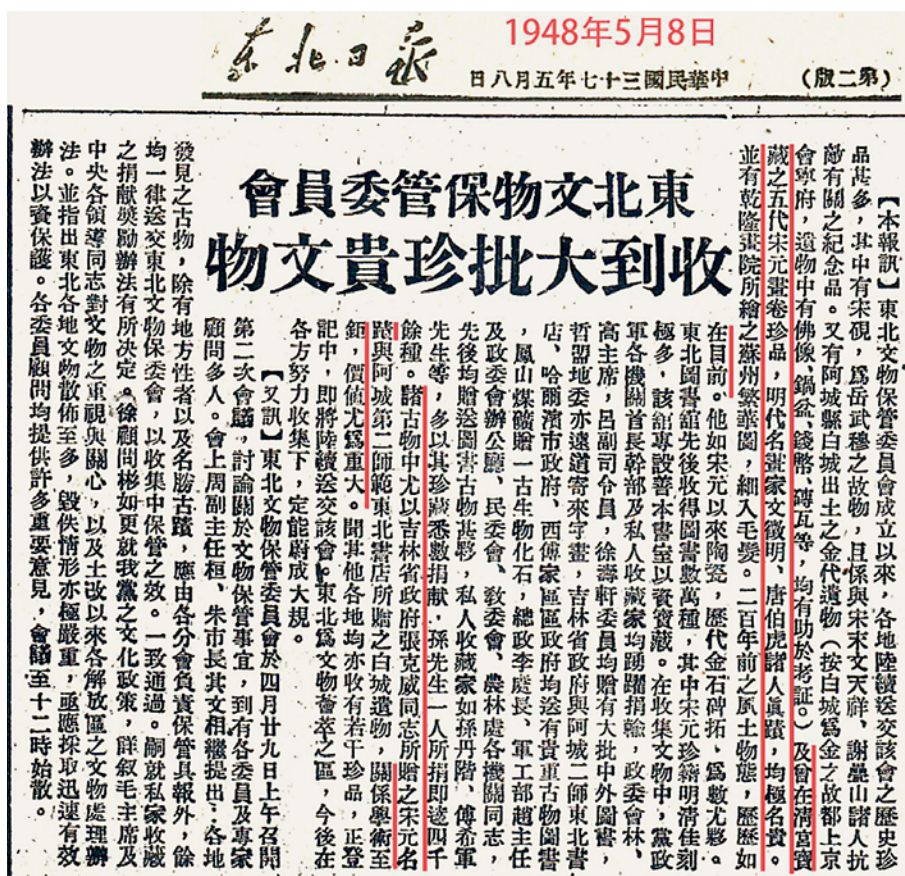
罗福颐《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敬胜斋）著录，《佚目》外物。真迹。王恩庆交出，故宫博物院藏。

只有罗福颐这一件，在《佚目》之中没有，但确为宫中著录，称为「《佚目》外物」。它应视同于《佚目》书画。

五件《佚目》内外的《清明上河图》均各有着落，并无张克威上交的这一件。张克威、林枫、王修经手的一件《清明上河图》竟然不翼而飞！这怎么解释？真的无法解释，于是由此引起了一种猜想：这里无端消失一件，而东北银行拨交的却有三件之多！其中一件会不会是

张克威所上交？会不会是博物馆或杨仁恺什么地方搞错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杨仁恺发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这一说法就可能不成立了。张克威、林枫或王修很可能在杨仁恺之前早已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真迹，由张克威收集到，最终为东北博物馆所收藏。

事情演变成：如果找不到张克威上交的这件，那它就有可能是三件中的一件，它很可能就是真迹！否则，就该说出它在哪儿——难怪疑案至今无解。笔者经过仔细寻找线索，终于发现了一篇报道——《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



《东北日报》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上《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收到大批珍贵文物》的报道
吴峰风供图

收到大批珍贵文物》。仔细阅读这篇报道之后，发现记述东北文管会收到的书画作品和它们的捐赠者的情况，集中在如下文字中：「曾在清宮宝藏之五代宋元画卷珍品，明代名画家文徵明、唐伯虎诸人真迹，均极名贵。并有乾隆画院所绘之苏州繁华图，细如毛发。二百年前之风土物态，历历如在目前。……诸古物中尤以吉林省政府张克威同志所赠之宋元名迹……关系学术至鉅，价值尤为重大。」

这段文字实际上已告诉我们，张克威同志所赠的书画，主要有宋元名迹（未列举画作），明代画家文徵明、唐伯虎真迹，以及乾隆画院所绘《苏州繁华图》。这在《国宝沉浮录》中可得到验证。书中有专门一节，为东北文管会收集到的书画，含文徵明的《桃园问津图》和《三亭图》，更有乾隆如意馆（类似于画院）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在书中易名为《姑苏繁华图》。与《东北日报》报道相对照，东北文管会无捐赠者姓名的书画，可以推定就是张克威所赠，其中包括唐伯虎唯一的一件《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



书中所记与报道完全吻合，其中并没有《清明上河图》。对此只有一种解释：王修前辈的一句「《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是误将《盛世滋生图》记成了《清明上河图》。因为《东北日报》这篇报道除了王修前辈本人，别人是写不出来的，并非他人在报道中遗漏。原因有二：首先，据知情者回忆，当时东北文管会的文物只有王修和李茂林同志负责。李是一位八路军军营连级干部，没有文化，忠诚可靠，只负责保管。因此，这一报道唯有王修前辈能够执笔。其次，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能将题为《盛世滋生图》的画作在报道中更名为《苏州繁华图》，改掉了歌颂乾隆盛世的旧名，按内容命名，其历史与文化素养可见一斑，除王修前辈本人，他人是做不到的，无权这样做的。在王修的回忆中，此画经过鉴定，足以证明它就是《盛世滋生图》，不存在另一件《清明上河图》。

在发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之前，人们往往将仇英仿作中的苏州街市误作《清明上河图》原作主题，而乾隆时期的《盛世滋生图》终究是明代仇英仿作的沿袭，只是宏大了许多，记忆



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卷
纸本设色 纵三五·八厘米 横一二二五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相混情有可原。何况王修同志《林枫与东北文物工作》一文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当时前辈已近八十高龄。

需要指出的是，张克威同志保护文物的功绩并不因此而失色。他确实自己

一人就收集上交了十余件《佚目》书画，其中不乏珍贵文物。《姑苏繁华图》的文献价值与极强的欣赏性在《国宝沉浮录》中被充分肯定。

至此，《清明上河图》回归的「长

春说」也可以排除了，只剩下「通化说」。虽然国宝回归疑案已逐步解开，但「通化说」要立足，依然需要足够的证据支撑。

国宝回归

一九四五年十月，东北局决定在通化创建东北的第一个后方根据地，并上报党中央。随后一批干部被派往通化，一些机构和学校也奔赴通化。其中，刘西元为胶东军区任命，担任通化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率胶东军区招远独立团三营，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到达通化。他随后立即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成立中共通化地委，任书记。地委下辖：通化市、通化县、辑安（集安）、柳河、辉南、临江、蒙江（靖宇）、抚松、长白九个县市。

吴溉之，东北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任命，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方后勤司令部政委，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赶到通化。

朱瑞，东北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任命，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方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十二月初率延安炮兵学校赶到通

化，后方后勤司令部正式成立，任司令员，吴溉之任政委，刘西元任副司令员。后方后勤司令部的任务是「指挥一切大后方后勤机关、学校及部队之工作」。

叶季壮，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前总后勤部部长兼东北银行总经理，十二月初率前总后勤部到达通化。一九四六年一月，东北银行总行转移到通化，与叶季壮总经理会合。

何长工，东北局一九四六年一月任命，我军后方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初率抗日军政大学长途跋涉到达通化。《清明上河图》等一批国宝的回归，正与通化作为后方根据地的大环境和特殊条件紧密相关。

溥仪离开大栗子沟，并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所俘之后，留在大栗子沟的溥仪亲眷和宫内府人员于十一月中旬即搬到了临江县临江公寓。

田乃庆先生所写的《溥仪窃宝收缴纪实》根据武清禄同志的回忆录《还国宝于人民》述说了收缴的过程和结果。十二月八日，我军解放了临江。据文中所述，溥仪留下的这伙人隐藏、转移文物国宝等行为引起了我军注意。十二月

阅读链接

武清禄（一九二〇年～二〇〇一年）

◎ 武清禄，河北平山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四〇年任罗荣桓元帅秘书。一九四四年任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协理员。一九四五年任东满人民自治军后勤部通化办事处负责人，曾率工作组圆满完成对伪满宫内府人员的所藏溥仪窃宝的收缴任务。后参加四保临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任职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勋章，二级自由解放勋章，曾任国家体委政治部副主任。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与儿孙在天坛公园散步，谈笑中安然辞世，享年八十一岁。



下旬经批准，一个收缴伪皇宫国宝的行动在临江开始。收缴工作的负责人是武清禄。下面省略过程，只说结果。

收缴工作组共六七人，所收缴物品分别装了二十八个皮箱，运回了通化：

「武清禄同志回忆收缴的艺术珍品有：国画三十多幅，其中最珍贵的是汉朝的一幅丝绢山水画，可谓无价之宝；罕见的五百多年（有的同志记忆六百多年）的一棵长白山的野山参，是伪通化省奉献给溥仪皇帝的贡品，参主体约三寸多长，拇指粗，根须茂密丰满，全身二尺多长，装在一个精制的玻璃盒内，用红绒布托底，在盒子外部左下角，注有人参的重量，长度及生长年限等数据以及采集时间。其他有金银器皿（有一套金碗、金酒杯，银具很多），首饰、珍珠、玛瑙、翡翠、玉器 etc. 还有一些属于日、法、意、美、英等帝国主义政府同伪满洲国外交往来的礼品，光是各种表，就有几十种。金扣、戒指、小金表、各国最高级的烟、酒等等。」（田乃庆《溥仪窃宝收缴纪实》，《生态文化》二〇〇五年第五期）

收缴国画三十多幅已经相当多，但对比东北银行向东北博物馆移交的一百

二十余幅书画，明显不够数。「其中最珍贵的是汉朝的一幅丝绢山水画，可谓无价之宝」，不知是指哪一件。其中

不像有《清明上河图》，别说三件，一件也没有。武清禄他们不可能遗漏一件人物众多、画长过五米、带题跋超过十三米的市井风俗长卷。从时间上说，临江解放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武清禄接到收缴任务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溥仪的宫廷人员已经被控制了十多天，期间不会有任何收缴行动。经查，武清禄的收缴行动并不是最早的，更不是唯一的一次。王文锋研究员的《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包含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文中介绍：「溥仪亲信随侍严桐江，他实际上是宫内府遗留大栗子沟人员的实际管理者。解放后，他在长春市的粮食部门工作。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写出了交待材料对在临江收缴国宝的过程也曾提到。」（王文锋《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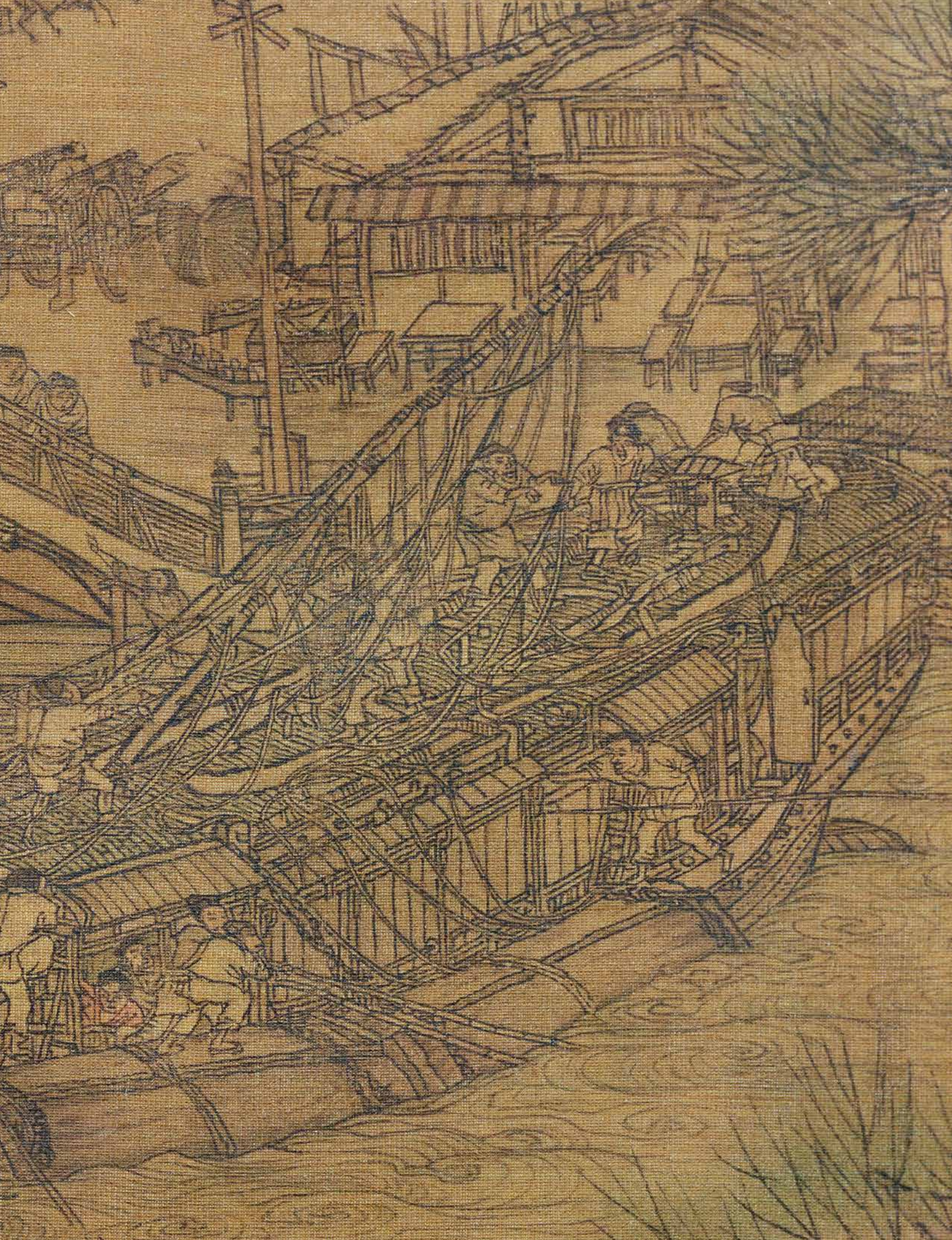
有理由相信，王文锋在文中披露的以下一些情节，来自于严桐江的交代材料，因为严桐江并没有写过任何回忆录，其他

文献中也不曾见过如此清晰的收缴内容。

溥仪走后，长春带来的物品还有四十多箱。

当时伪宫内府近侍处处长毓崇和溥仪的亲信随侍严桐江以及溥仪的二妹夫郑广元管理这个摊子。他们将所带的手卷、金银珠宝、首饰等分给个人保存。由于形势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掠一空的危险，所以联系准备搬到临江县，又由毓纹、严桐江向个人追要所分的溥仪用品，收了一夜，要回的也是为数有限，于是又将原剩余部分挑出精华，共装了七皮包，由毓纹和伪宫内府室会计审查局审查官吴少香雇了一辆马车，将这些先行运了临江县，寄存在临江县商会会长林某所开的商店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严桐江与铁路方面联系租了一列小运转车，将全部人员和物品迁到了临江县，租借了临江公寓。不久，临江县解放，东北民主联军一团团长许凤山，政委李金明来到临江公寓接收溥仪的物品，他们首先说明了我党我军的政策，李政委宣布汉奸傀儡皇帝溥仪的东西应归还人民，所以溥仪的财物全部查封，随行人员的行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李要检查，不需用的物品全部交出。次日早，便将装在木箱、皮包内溥仪剩余的物品种二十八箱接收过去，但其中的珍品甚少，又经过一再追查，方将寄存在林某商店内的几皮包贵重物品交出。（王文铎《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

上面的描写是真正的要点！「团长许凤山，政委李金明」「将装在木箱、皮包内溥仪剩余的物品种二十八箱接收过去」，「又经过一再追查，方将寄存在林某商店内的几皮包贵重物品交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收缴。毓嵒（溥仪的一个侄子）曾回忆，由长春逃往大栗子沟时，带走的珍贵文物达五十七箱，箱长一米多，高五十厘米，宽四十厘米。（向斯《最后的紫禁城》，中国工人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二六五页）这木箱要远大于一般皮箱，以上述收缴的规模计算，其中包含书画手卷九十多件应该不成问题，林某商店的七皮包贵重物品应是其中精华。这次收缴的书画九十多件，加武清禄后来收缴的书画三十多件才够东北银行向东北博物馆移交的数。三卷《清明上河图》以及多数精品，应早已包括在第一次收缴的物品之中。



阅读链接

谢凤山（一九一五年～一九八八年）

◎ 谢凤山，江西瑞金人。一九三〇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战士到指导员，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参加平型关、百团大战、挺进山东、反扫荡等战斗。挺进东北，收复临江五县，参加辽沈战役。又入朝作战。他作战英勇，屡建战功，曾三次负伤，在平型关等战斗中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后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河南军区洛阳分区第二政治委员。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七日，因病在洛阳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笔者虽然查不到「许凤山」和「李金明」两位同志的情况，但查到了负责临江收缴的通化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谢凤山同志的情况。他在上文中应该是被误写成了「一团团长许凤山」。谢凤山政委是这次收缴工作的负责人，证据充分：「……通化支队进入临江已是十二月八日下午四点多钟，天快黑了。第二天，罗衡就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进驻了临江县政府，宣布临江县民主自治政府成立。通化支队随即向外县进发，继续剿匪和清除日伪残余。临江县民主自

治政府要征粮草，搞被服，接收武器弹药，还要扩建队伍，遣送在临江的日籍人员，根本无暇过问伪满皇帝溥仪从大栗子逃走及有关宫内府的情况。清缴宫内府的国宝珍品，主要由通化军分区和谢凤山政委负责。」（董新春《原临江县的剿匪斗争》，《白山年鉴（二〇一五年）》，第九四页）

如果仅仅一篇文章尚不足为证，一本纪实书籍中的文章给予了进一步证明：「……临江解放后，团政委罗衡留下当县长，政治部主任谢凤山带人收缴

了由大栗子迁到临江的伪皇帝的亲眷和宫内府的珠宝财物，部队留在临江过春节，节后去抚松剿匪。」（刘小艺《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〇五页）

上述两段文字充分证明，在临江负责收缴溥仪伪官的书画珠宝等物品的，首先是我军通化支队谢凤山副政委，后续的是军区后勤办事处武清禄同志。而

《清明上河图》真迹应该在第一批收缴的物品之中，很可能是先被藏匿于临江商会会长林某所开的商店里，后被谢凤山带队收缴到我军手中。

随后，从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刘西元司令员所写《回忆进军东北及通化平叛》一文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所收缴珍贵财物的上交和存放处。

通化暴乱被平定不久，大量的告状信和各种流言蜚语就袭向各部门主要首长，无中生有地罗织出各种罪名对我们进行中伤。……当时没收的伪满州国的贵重财物就堆放在我住宅的一个房间里，房间的钥匙由我掌握，而这堆细软物品竟没有统一登记造册，致使审查只能通过群众调查和推断来完成，好

在前后结论推翻了莫须有的罪名。（刘

西元《回忆进军东北及通化平叛》，见载网络：<http://www.wphoto.net/qianbei/article/ts/show/articleid/18009/>，发表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本文中，收缴物品上交到通化总部、在刘西元司令员住处集中堆放等环节，与之前谢凤山副政委和武清禄同志的收缴，形成了收缴、上交和集中存放的完整证据链。

「通化说」余下的问题还有一百二十余件书画和百件珠宝由东北银行保存，以及陈云批示等。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东北局决定，通化分省委升格为通化省委，由东北局直接领导。后方司令部改为通化保安司令部。吴溉之任省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何长工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朱瑞任第一副司令员，刘西元任第二副司令员，王铮任省委副书记。东北局委员、总后勤部长兼东北银行总行行长叶季壮同志带领总后勤部、东北银行两支队伍，在通化后方根据地紧张地筹集枪支弹药和战备物资，筹备印制和发行解放区货币。

可以推测：通化省委与保安司令

部成立之后，因有刘西元同志前述的告状信事件，省委书记吴溉之必然要与何长工、朱瑞、刘西元、王铮等领导研究伪皇官物品的处理，也必然会与叶季壮同志商议上交东北局事宜，而请示分管财经的陈云同志也是必然的。最终会根据陈云同志意见，将共计一百二十余件书画和百件珠宝玉翠移交东北银行保管。其余一般贵重物品移交总后勤部。

以上只是推测，并没有哪位亲历者对此写过回忆文章或说过什么。一九五〇年，陈云批示，东北银行保存的书画珠宝移交东北博物馆（有关批示细节尚需新材料的发现而落实）。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战火纷飞，军情紧急，我军尚立足未稳的东北战场，当时的每支部队，每位指战员的任务都极其繁重，却尽心尽责地收缴、保存了这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在转战南北的跋涉中，在冰雪严寒的露营地，东北银行的干部战士始终守护着这批贵重物品，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将《清明上河图》等国宝收回人民手中的通化与临江，更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回归之城！